

总量均衡区间与宏观调控效应时滞

管怀瑾

(南通大学商学院,江苏南通 226007)

摘要: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由于调整供给量须耗费调节成本,因而传统分析中的“总量均衡中心点”两侧便分别存在着“低位临界点”与“高位临界点”,这两点界定了一个特殊的总量均衡区间。总量均衡区间的存在,使宏观调控必然出现一种长期以来未曾引起人们注意的调控效应“时滞”。为缩短以致消除这种“时滞”,宏观调控有必要确立并遵循“适度超前调控原则”。

关键词:调节成本;总量均衡区间;时滞

中图分类号:F20;F01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5)01-0133-12

一、从“总量均衡中心点”到“总量均衡区间”

将均衡供求总量由传统的“点”概念修正为“区间”概念,须以确认调节成本的存在为前提。因此,我们首先对调节成本问题作一简要说明。众所周知,在竞争性市场条件下,需求与供给是两个十分活跃的变量,厂商要获得满意的生产经营效益,就必须在价格信号指引下经常调整生产规模,使供给量尽量适应需求量的变动。显然,这种对生产规模从而对供给量的经常性调节,如同其他经济行为一样,不可能是无代价的,亦即从经济学角度看,调节本身是需要支付成本的。笔者认为,这种特殊的成本可称为微观调节成本,并可一般地定义为:厂商将其供给量调整到合理水平所需的费用。微观调节成本通常由三部分构成:一是摩擦耗费。调整生产规模以扩大或减少供给量,势必引起各种技术性、经济性摩擦,从而造成损失。比如,在扩大生产规模时,增加机器设备和生产工人的负荷,会使各相应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递减;生产资源在局部范围内重新组合与配置,会产生种种技术性的震荡和碰撞,使总体生产效率有所下降,等等。在压缩生产规模时,部分机器设备和劳动力会出现闲置,解雇工人则需支付一定的补偿费用,而且还将因此失去一批宝贵的技术人员、管理

收稿日期:2004-11-10

作者简介:管怀瑾(1951—),男,江苏南通人,南通大学商学院教授。

人员和熟练工人;同时,供给量的减少还将引起规模效益上的损失,等等。摩擦耗费是厂商调整生产规模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损失,通常在微观调节成本中占有相当可观的比重。二是时间延滞。微观调节通常均需花费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才能完成。在这段时间里,厂商的生产经营效益即便不是一个负数,也会与正常合理状态下理应产生的效益存在一个差额。这一差额的大小是由调节方向、调节内容、调节效率等因素所决定的。因此,这种损失理应视为微观调节成本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一般地说,其大小总是与微观调节所经历的时间长短大体上成正比例关系。三是操作费用。厂商要有效地调节自身的生产规模,需完成一系列复杂的实际操作,如市场调查与预测、拟定调节方案并作出决策、实施决策并全程监控等等。这一系列操作都需耗费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这部分费用显然是最直接意义上的微观调节成本。

以上分析的是单个厂商的微观调节成本及其构成。应当指出的是,这一分析还可进一步扩展到宏观范围以内。因为从理论上说,正如各单个厂商的供给量可以加总成一个社会总供给量一样,各单个厂商的微观调节成本也是可以加总成一个全体厂商的总的供给量调节成本——总量调节成本的。这一总量调节成本,实际上是微观领域内无数单个厂商的微观调节成本在宏观层面上的综合反映。显然,总量调节成本在构成上也必然与单个厂商的微观调节成本一致,即也主要由摩擦耗费、时间延滞和操作费用三部分所构成。

微观调节成本及其加总——总量调节成本的存在,使宏观范围内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化的过程复杂化了。原先,在不考虑调节成本时,总供给与总需求对比的波动将引导社会总产量或国民收入达到一均衡点。按照传统分析,这一均衡过程可简要表述如下:

设总需求与总供给函数均为线性函数:

$$AD = m + nQ \quad (1)$$

$$AS = u + vQ \quad (2)$$

式中,AD为总需求或总需求价格,AS为总供给或总供给价格,Q为总产量; m 、 n 、 u 、 v 均为大于1的常数,且 $m > u$, $n < v$ 。

按照传统分析,当总供给与总需求相等时将达到均衡状态,这时的产量即为均衡供求总量。令 $AD = AS$,将(1)、(2)式代入,解之得:

$$Q_E = \frac{m - u}{v - n}$$

Q_E 即为均衡供求总量。 Q_E 之所以为均衡点,是因为:

当实际产量 $Q < Q_E$ 时,有: $Q < \frac{m - u}{v - n}$,从而 $m + nQ > u + vQ$,即 $AD > AS$,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因而价格上涨,厂商见有利可图,自然会扩大生产规模,于是社会总产量增加,从数轴上看,即 Q 向 Q_E 方向右移。

当实际产量 $Q > Q_E$ 时,有: $Q > \frac{m-u}{v-n}$, 从而 $m + nQ < u + vQ$, 即 $AD < AS$, 总需求小于总供给, 因而价格下跌, 厂商为避免损失, 便会压缩生产规模, 于是社会总产量减少, 在数轴上便是 Q 向 Q_E 方向左移。

只有在实际产量 $Q = Q_E$ 、从而 $AD = AS$ 时, 全体厂商愿意生产和出售的产量, 才正好等于全体居民、企业和政府所愿意购买的商品和劳务的总量, 这时价格总水平才相对静止下来, 厂商们既不扩大也不压缩生产, 于是社会总产量得以确定并相对稳定在 Q_E 水平上。这就达成了总量均衡状态。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 这种均衡状态的基本特征在于, 均衡维持在一个特定的点 Q_E 上。为便于展开分析起见, 下面我们一律称这一均衡点为“总量均衡中心点”。

但如果引进调节成本概念, 上述过程便不再如此简单了。

我们首先分析初始总产量低于“总量均衡中心点”的情况。设初始总产量为 Q_1 , $Q_1 < Q_E$ 。如前所述, 这时 $AD > AS$, 即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若记产量为 Q_1 时的总需求价格为 AD_1 、总供给价格为 AS_1 的话, 那么厂商们现在可获得额外收益 $AD_1 - AS_1$, 因而他们有扩大生产、增加产量的倾向。我们将这时厂商们扩大供给量所能获得的额外收益称为“总量调节收益”, 并记其为 TRa 。不难理解, 根据总供给函数与总需求函数的定义, 在供给量由 Q_1 逐步扩大的过程中, 当产量达到某一点 Q 时, 厂商们累计所获得的“总量调节收益” TRa 应是区间 $[Q_1, Q]$ 上的一个定积分:

$$TRa = \int_{Q_1}^Q (AD - AS) dQ = \int_{Q_1}^Q [(m-u) - (v-n)Q] dQ \quad (3)$$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将这一过程中每增加一单位供给量所增加的“总量调节收益”定义为“边际调节收益”, 并记其为 MRa 的话, 则 MRa 显然应为 TRa 的一阶导数:

$$MRa = \frac{dTRa}{dQ} = AD - AS = (m-u) - (v-n)Q \quad (4)$$

易见, 由于 $-(v-n) < 0$, 所以 MRa 是 Q 的减函数, 亦即边际调节收益是随着总产量的增加而递减的。

再看总量调节成本的情况。如前所述, 社会范围内的总的供给量调节成本是各厂商微观调节成本的加总, 其构成与微观调节成本相同, 也是由摩擦耗费、时间延滞和操作费用三部分所组成。于是便有:

$$Ca = F + T + O \quad (5)$$

式中, Ca 为总量调节成本, F 为摩擦耗费, T 为时间延滞, O 为操作费用。

按照一般经验可以推定, 在厂商们调整生产规模、逐步扩大供给量的过程中, 摩擦耗费和时间延滞因其与生产过程的特定联系, 通常便与供给量本身的规模和水平存在大体同步变化的关系, 即 F 、 T 均可视为 Q 的增函数, 为简便

起见,可记为:

$$F = \alpha Q \quad (6)$$

$$T = \beta Q \quad (7)$$

式中 α, β 均为大于 0 的常数。而操作费用显然也与供给量的规模密切相关,因为一般而言,生产规模越大,调整供给量过程中的各种调控操作便都越复杂,从而使得操作费用也越高。所以,操作费用实际上也是 Q 的增函数。于是我们又有:

$$O = \gamma Q \quad (8)$$

式中 γ 亦为大于 0 的常数。将(6)、(7)、(8)式代入(5)式,有:

$$Ca = \alpha Q + \beta Q + \gamma Q = (\alpha + \beta + \gamma)Q \quad (9)$$

我们称(9)式为总量调节成本函数。容易理解,在供给量由 Q_1 逐步扩大的过程中,当产量达到某一点 Q 时,若记其累计的总量调节成本为 TCa 的话,则 TCa 便是区间 $[Q_1, Q]$ 上的一个定积分:

$$TCa = \int_{Q_1}^Q (\alpha + \beta + \gamma)Q dQ \quad (10)$$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将这一过程中每增加一单位供给量所增加的调节成本定义为边际调节成本并记其为 MCa 的话,那么 MCa 显然系 TCa 的一阶导数,即:

$$MCa = \frac{dTCa}{dQ} = (\alpha + \beta + \gamma)Q \quad (11)$$

易见,由于 $\alpha + \beta + \gamma > 0$,所以 MCa 是 Q 的增函数,亦即边际调节成本是随着总产量的增加而递增的。

这样,在厂商们调整生产规模从而扩大供给量的过程中,一方面存在递减着的边际调节收益,另一方面则存在递增着的边际调节成本,因而厂商们调节生产规模、扩大供给量的行为客观上便存在一个合理界限的问题,亦即从理论上说,厂商们不应等到供给量最终扩大到“总量均衡中心点”、而是在此之前便应中止对生产规模的调节,否则将蒙受总体效益上的损失。那么这一主动中止调节的合理界限应在哪里呢?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再引进一个新概念——“净调节收益”。所谓净调节收益,是指总量调节收益减去总量调节成本后所得到的净收益。若记净调节收益为 Πa 的话,则有:

$$\Pi a = TRa - TCa = \int_{Q_1}^Q [(m - u) - (v - n)Q] dQ - \int_{Q_1}^Q (\alpha + \beta + \gamma)Q dQ \quad (12)$$

求 Πa 对 Q 的二阶导数,得:

$$\frac{d^2 \Pi a}{dQ^2} = -(v - n) - (\alpha + \beta + \gamma) < 0$$

于是可知 Π_a 有极大值。求该极大值:

令 $\frac{d\Pi_a}{dQ} = 0$, 有: $(m-u) - (v-n)Q - (\alpha + \beta + \gamma)Q = 0$, 解之得:

$$Q_L = \frac{m-u}{(v-n) + (\alpha + \beta + \gamma)}$$

Q_L 便是一个重要的临界点。它具有如下性质:

当实际产量 $Q < Q_L$ 时, 有: $Q < \frac{m-u}{(v-n) + (\alpha + \beta + \gamma)}$, 即 $(m-u) - (v-n)Q > (\alpha + \beta + \gamma)Q$, 亦即 $MR_a > MC_a$, 这就是说, 边际调节收益大于边际调节成本, 厂商们扩大生产规模的调节行为所带来的调节收益高于其为此付出的调节成本, 因而, 这时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供给是合理的。

当实际产量 $Q > Q_L$ 时, 有: $Q > \frac{m-u}{(v-n) + (\alpha + \beta + \gamma)}$, 即 $(\alpha + \beta + \gamma)Q > (m-u) - (v-n)Q$, 亦即 $MC_a > MR_a$, 这就是说, 边际调节成本大于边际调节收益, 厂商们扩大生产规模的调节行为所耗费的调节成本, 已高于由此所能获得的调节收益, 因而这种调节已是不经济的, 应予中止。

可见, Q_L 是厂商们调整生产规模、扩大供给量的一个重要分界点。由于 $Q_L = \frac{m-u}{(v-n) + (\alpha + \beta + \gamma)} < \frac{m-u}{v-n} = Q_E$, 所以从数轴上看, Q_L 位于“总量均衡中心点” Q_E 的左侧, 因此, 我们称 Q_L 为供给量调节的“低位临界点”, 它决定了厂商们主动中止调节生产规模、扩大供给量行为的合理上限。

以上讨论了初始供给量低于“总量均衡中心点”的情况。在初始供给量高于“总量均衡中心点”时, 问题依然如此。厂商们调整生产规模、压缩供给量的努力, 一方面会减少因市场供过于求造成的损失, 另一方面则同样必须付出调节成本, 因为压缩生产规模, 同样会引起摩擦耗费、时间延滞和操作费用。因此, 与前文分析相类似, 在这一过程中厂商们也会在压缩生产规模所减少的损失, 与为此所必须付出的调节成本之间进行权衡, 以确定一损失最小的调节界限。于是, 我们便可以找到供给量调节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分界点——“高位临界点”。具体分析如下:

设初始总产量为 Q_2 , $Q_2 > Q_E$ 。前文已述, 这时将有 $AS > AD$, 即总供给大于总需求, 于是价格下跌, 厂商们将蒙受因供过于求而造成的损失。若记供给量为 Q_2 时的总需求价格为 AD_2 、总供给价格为 AS_2 的话, 那么, 现在全体厂商所蒙受的损失可表示为 $AS_2 - AD_2$, 或者也可以说, 这时他们如压缩生产、减少供给量的话, 便可减少 $AS_2 - AD_2$ 的损失。我们称厂商们压缩生产削减供给所减少的损失为“总量调节减亏”, 并记其为 TR_a' 。不难理解, 在供给量由 Q_2 逐步缩减的过程中, 当产量减少到某一点 Q 时, 厂商们累计所获得的“总量调节减亏” TR_a' 便是区间 $[Q, Q_2]$ 上的一个定积分:

$$\begin{aligned} TRa' &= \int_{Q_2}^Q (AS - AD)d(-Q) = \int_Q^{Q_2} (AS - AD)dQ \\ &= \int_Q^{Q_2} [(u - m) + (v - n)Q]dQ \end{aligned} \quad (13)$$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将每减少一单位供给量所增加的“总量调节减亏”定义为“边际调节减亏”并记为 MRa' 的话, 则 MRa' 应为 TRa' 的一阶导数:

$$MRa' = \frac{dTRa'}{d(-Q)} = AS - AD = (u - m) + (v - n)Q \quad (14)$$

再看总量调节成本的情况。易见, 在总供给由 Q_2 逐步减少至 Q 的过程中, 若记厂商们累计所付出的总量调节成本为 TCa' 的话, 则 TCa' 便应为区间 $[Q, Q_2]$ 上的一个定积分:

$$TCa' = \int_{Q_2}^Q (\alpha + \beta + \gamma)Qd(-Q) = \int_Q^{Q_2} (\alpha + \beta + \gamma)QdQ \quad (15)$$

相应地, 其边际调节成本 MCa' 应为 TCa' 的一阶导数:

$$MCa' = \frac{dTCa'}{d(-Q)} = (\alpha + \beta + \gamma)Q \quad (16)$$

类似前文分析, 现在, 厂商们的净调节收益则表现为“总量调节减亏”减去调节成本的差, 我们记这种有别于前述总量扩张过程中净调节收益的、具有新含义的“净调节收益”为 $\Pi a'$, 则:

$$\Pi a' = TRa' - TCa' = \int_Q^{Q_2} [(u - m) + (v - n)Q]dQ - \int_Q^{Q_2} (\alpha + \beta + \gamma)QdQ \quad (17)$$

为确定总量缩减过程中总供给规模调节的临界点, 下面我们来讨论 $\Pi a'$ 的极值问题。求 $\Pi a'$ 对 $-Q$ 的二阶导数, 得:

$$\frac{d^2 \Pi a'}{d(-Q)^2} = (n - v) + (\alpha + \beta + \gamma) \quad (18)$$

式中, 等号右边由 $(n - v)$ 与 $(\alpha + \beta + \gamma)$ 两项组成。因为 $n - v < 0, \alpha + \beta + \gamma > 0$, 所以 $\frac{d^2 \Pi a'}{d(-Q)^2}$ 的符号需要讨论。但根据我们现在所研究问题的具体性质, 可以肯定, 在总供给量由 Q_2 逐步减少的过程中, 必然存在一使厂商们总的损失最小、或者说使其“净调节收益”值达到最大的点存在。据此便可以推知, 必有:

$$\frac{d^2 \Pi a'}{d(-Q)^2} < 0$$

即 $(n - v) + (\alpha + \beta + \gamma) < 0$, 或 $(v - n) - (\alpha + \beta + \gamma) > 0$ 。

现在就来确定该极值点。令 $\frac{d\Pi a'}{d(-Q)}=0$, 有:

$$[(u-m)+(v-n)Q]-(\alpha+\beta+\gamma)Q=0, \text{解之得:}$$

$$Q_H = \frac{m-u}{(v-n)-(\alpha+\beta+\gamma)}$$

Q_H 即为我们所要确定的另一个重要的临界点。它具有如下特性:

当实际产量 $Q > Q_H$ 时, 有: $Q > \frac{m-u}{(v-n)-(\alpha+\beta+\gamma)}$ 。即 $(u-m)+(v-n)Q > (\alpha+\beta+\gamma)Q$, 亦即 $MRa' > MCa'$, 这就是说, 边际调节减亏大于边际调节成本, 表明在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宏观背景下, 厂商们压缩生产规模所减少的供过于求损失, 大于为此所耗费的调节成本, 因而, 这时压缩生产规模、减少供给量是合理的。

当实际产量 $Q < Q_H$ 时, 有: $Q < \frac{m-u}{(v-n)-(\alpha+\beta+\gamma)}$, 即 $(\alpha+\beta+\gamma)Q > (u-m)+(v-n)Q$, 亦即 $MCa' > MRa'$, 这就是说, 边际调节成本大于边际调节减亏, 表明尽管宏观范围内总供给大于总需求, 但这时厂商们压缩生产规模的调节行为所减少的损失, 已不及为此所耗费的调节成本, 因而这时压缩生产规模、减少供给量已是不经济的, 应予中止。

于是, Q_H 便成为厂商们调整生产规模、压缩供给量的一个重要分界点, 它决定了厂商们主动中止调节生产规模、压缩供给量行为的合理下限。由于

$$Q_H = \frac{m-u}{(v-n)-(\alpha+\beta+\gamma)} > \frac{m-u}{v-n} = Q_E, \text{所以在数轴上, } Q_H \text{ 位于“总量均衡中心点”} Q_E \text{ 的右侧, 因此, 我们称 } Q_H \text{ 为供给量调节的“高位临界点”。}$$

综合以上两方面分析可见, 由于存在调节成本, 因而在“总量均衡中心点”两侧实际上分别存在着“低位临界点”与“高位临界点”, 在这两点之间厂商们已不再对生产规模进行主动调节, 也就是说, 社会总产量一旦进入该区间, 市场机制便对产量变动不再起作用。于是, 从市场运行角度看, 这时的社会供求总量便应视为已达成均衡状态。所以, “低位临界点”与“高位临界点”便界定了一个特殊的区间, 我们将其称为“总量均衡区间”。至此, 传统分析中的均衡总产出或均衡国民收入, 便由原先的“点”概念被修正为“区间”概念。

二、宏观调控中一种特殊的“时滞”

总量均衡区间的出现, 对宏观经济运行将产生多方面的重要影响, 从而使宏观调控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其中, 应当引起高度关注的是, 总量均衡区间的存在将导致宏观调控产生一种特殊的、长期以来未曾引起人们注意的调控效应“时滞”。

为阐明这一特殊“时滞”的产生过程, 我们首先就总量均衡区间的特殊性指

出以下两点:第一,总量均衡区间不会因为政府的宏观调控而取消。在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政府总量调控的主要任务是实施短期需求管理,即通过操作宏观经济政策相机扩张或压缩总需求,来求得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而各项短期需求管理政策措施的实际效应,在于改变需求条件,使总需求曲线向上或向下移动,从而达到符合宏观调控目标要求的总量均衡。但这种宏观层面上需求条件的改变以及总需求曲线的移动,不可能改变微观领域内各厂商调整自身生产规模须耗费调节成本这一基本事实,不可能取消厂商对调节收益与调节成本的权衡,从而也就不可能取消宏观层面上客观存在着的总量均衡区间。事实上,在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中,政府实施各种扩张性或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的结果,只是在推动总需求曲线上移或下移的过程中,同时也推动总量均衡区间相应地右移或左移,但却不可能使其消失。第二,在总量扩张或收缩过程中,实际的总量变动通常总是止步于总量均衡区间的“低位临界点”或“高位临界点”处。具体说,即在宏观经济运行处于总量扩张阶段时,总需求快速增长,拉动总供给相应迅速攀升,使社会经济总量向更高的总量均衡水平推进,但由于存在总量均衡区间,社会经济扩张的浪潮在到达新的更高水平的“总量均衡中心点”之前,便会为“低位临界点”所阻滞,而止息于新的总量均衡区间的下限处。在宏观经济运行处于总量收缩阶段时,总需求滑落,总供给随之迅速下降,使社会经济总量向较低的总量均衡水平收缩,但同样地,由于存在总量均衡区间,社会经济总量收缩的势头在实际减少至新的较低水平的“总量均衡中心点”之前,便会为“高位临界点”所阻遏,而停步于新的总量均衡区间的上限处。

明确了以上两点,便可证明,总量均衡区间的存在必然导致宏观调控产生一种特殊的“时滞”。众所周知,在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宏观调控的基本规则简单说便是:经济过度膨胀时压缩总需求,经济过度萎缩时扩张总需求,以求得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在引入总量均衡区间概念、并考虑到实际经济运行中处于扩张或收缩进程中的现实社会经济总量总是位于总量均衡区间端点处的特性时,便容易理解,宏观调控这一基本规则的现实实施背景就是:一方面,在经济过热阶段,处于自发扩张过程中的现实社会经济总量一般位于右移着的总量均衡区间的“低位临界点”处;在经济衰退阶段,处于自发萎缩过程中的现实社会经济总量则一般位于左移着的总量均衡区间的“高位临界点”处。另一方面,从总量均衡区间的特性看,当受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影响的总需求发生变动时,总是由伴随着总需求曲线移动而移动着的总量均衡区间的端点引领实际社会经济总量扩张或收缩,即在政府压缩总需求、因而总需求曲线下移时,总是由随之同时左移的总量均衡区间的“高位临界点”引领现实的社会经济总量收缩;而在政府扩张总需求、因而总需求曲线上移时,则总是由随之同时右移的总量均衡区间的“低位临界点”引领现实的社会经济总量扩张。总量变动的这种规律性现象,势必导致旨在平衡供求总量的宏观调控

出现一种特殊的调控效应“时滞”。该“时滞”的产生机理简单地说就是,每当政府启动相关政策措施实行总量调控时,总是必须首先经历一个总需求曲线带动总量均衡区间移动一段相当于其两个临界点间距离的过程,尔后才会对现实的社会经济总量产生实际的扩张或压缩效应。具体说,在需要扩张总需求的场合,调控操作启动后的初始阶段,会有一个相关政策措施首先推动总需求曲线向上移动、带动总量均衡区间从原先的由其“高位临界点”自发引领现实社会经济总量萎缩过渡到由其“低位临界点”自觉引领现实社会经济总量扩张的过程;在需要压缩总需求的场合,调控操作启动后的初始阶段,则会会有一个相关政策措施首先推动总需求曲线向下移动、带动总量均衡区间从原先的由其“低位临界点”自发引领现实社会经济总量扩张过渡到由其“高位临界点”自觉引领现实社会经济总量收缩的过程。在这两个场合,都存在一共同的现象,即只有完成了引领社会经济总量实际变动的“临界点”的转换,现实的社会经济总量才会在宏观调控政策措施作用下发生预期的变动。于是,在宏观调控中便产生出一种特殊的调控效应“时滞”。

上述过程,可借助图形直观地予以表示。我们以经济衰退时期政府扩张总需求的宏观调控为例,对之作一简要说明。见图1。

图1中,横轴代表社会总产量 Q ,纵轴代表价格水平 P , AS 为总供给曲线, AD 为总需求曲线。经济衰退时期,总需求萎缩,总需求曲线从 AD_1 自发下移至 AD_2 位置,与此同时,相应的总量均衡区间亦由 $Q_{L1}Q_{H1}$ 左移至 $Q_{L2}Q_{H2}$ 。在这一过程中,实际社会总产量由总量均衡区间的“高位临界点”引领,一路下滑至 Q_{H2} 。如果此时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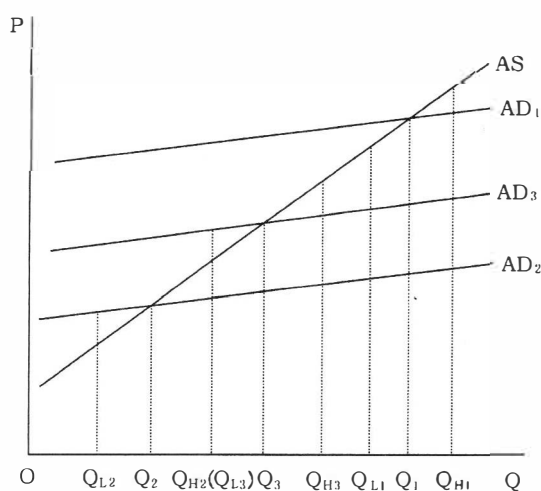


图1 扩张总需求过程中的宏观调控效应“时滞”

府启动扩张总需求的各项宏观经济政策,那么,总需求将停止滑落转而开始回升,总需求曲线将由 AD_2 开始向上移动,同时,与之如影随形的总量均衡区间亦将由 $Q_{L2}Q_{H2}$ 同步向右移动。但如前所述,由于受政府宏观调控政策驱动的现实总量扩张,总是由右移着的总量均衡区间的“低位临界点”所引领,因此,现在处于 Q_{H2} 点的社会经济总量,便只有待总需求曲线由 AD_2 上移至 AD_3 位置、从而 Q_{H2} 由原总量均衡区间 $Q_{L2}Q_{H2}$ 的“高位临界点”转变为新的总量均衡区间 $Q_{L3}Q_{H3}$ 的“低位临界点” Q_{L3} 时,才可能开始现实的扩张,即从既

有的 Q_{H2} 水平出发,由 Q_{L3} 引领而开始实际的右移过程。这样,我们看到,在总需求曲线由 AD_2 上移至 AD_3 的这段时间内,实际的社会经济总量便一直停留在 Q_{L2} (亦即 Q_{L3}) 水平上未曾变动。也就是说,从政府启动各项扩张性调控政策到现实的社会经济总量开始真正回升,其间存在着一个时间上的延滞,亦即出现了调控效应的“时滞”。

图 1 描述的是扩张总需求过程中宏观调控“时滞”的产生情况。在紧缩总需求过程中同样也存在这样的“时滞”,其产生机理显然可以类似的方式加以说明。

关于宏观调控中这种特殊的“时滞”,需要特别加以强调的有以下三点:

一是,该“时滞”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分析中宏观调控“时滞”的特殊“时滞”。传统分析中,所谓宏观调控“时滞”一般是指由于人们的认识滞后、决策滞后以及政策措施本身的作用传导需要时间等等所引起的调控效应滞后。而本文所揭示的宏观调控“时滞”则是一种与之完全不同的宏观调控效应滞后,该种效应滞后系由总量均衡区间的存在所引起,其产生机理迥异于传统分析中的“时滞”,因而是一种长期以来未曾引起人们注意的特殊的宏观调控“时滞”。惟其特殊,所以更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二是,该“时滞”的长度取决于总量均衡区间的大小。从图 1 不难看出,宏观调控中这种特殊“时滞”的长度,等于总需求曲线带动总量均衡区间移动一个相当于总量均衡区间的宽度所需的时间。而总量均衡区间的宽度,在理论上是可加以确定的。根据前文的分析,在假定总供给函数、总需求函数以及总量调节成本函数均为线性函数的情况下,若记总量均衡区间的宽度为 R 的话,则有:

$$\begin{aligned} R = Q_H - Q_L &= \frac{m-u}{(v-n) - (\alpha+\beta+\gamma)} - \frac{m-u}{(v-n) + (\alpha+\beta+\gamma)} \\ &= \frac{2(m-u)(\alpha+\beta+\gamma)}{(v-n)^2 - (\alpha+\beta+\gamma)^2} \end{aligned} \quad (19)$$

于是,在当时宏观经济运行环境中总需求曲线带动总量均衡区间移动 R ($R = \frac{2(m-u)(\alpha+\beta+\gamma)}{(v-n)^2 - (\alpha+\beta+\gamma)^2}$) 这段距离所需的时间,便是宏观调控特殊“时滞”的长度。

三是,该“时滞”在一定程度上是可加以控制的。由于总需求曲线带动总量均衡区间移动一个总量均衡区间宽度所需的时间,就是宏观调控特殊“时滞”的长度,因而该“时滞”便与总量均衡区间的大小密切相关。从(19)式看,总量均衡区间的宽度 R 取决于三个因素: $m-u$ 、 $v-n$ 和 $\alpha+\beta+\gamma$ 。其中, $m-u$ 、 $v-n$ 两项分别由表征总供给函数与总需求函数特征的参数所构成,一般而言短期内人们是难以对其加以控制的。而 $\alpha+\beta+\gamma$ 则有所不同,这一项系表征调节成本中摩擦耗费、时间延滞、操作费用大小的各系数之和,而这在相当程度上却是可以通过改善市场环境、提高管理水平等而加以改变的,也就是说,是可以由人的行为加以影响和控制的。于是,这就为通过恰当的措施在一

定程度上控制总量均衡区间的大小、从而最终控制宏观调控中这种特殊的“时滞”,提供了现实可能。如将(19)式的分子分母各除以 $\alpha+\beta+\gamma$,可得:

$$R = \frac{2(m-u)}{\frac{(v-n)^2}{\alpha+\beta+\gamma} - (\alpha+\beta+\gamma)}$$

不难看出,R与 $\alpha+\beta+\gamma$ 之间存在着同方向变化的关系,其实际经济意义是:调节成本越低,总量均衡区间就越小;反之,总量均衡区间便越大。因此,这就清楚地表明,降低调节成本将有效地缩短宏观调控中这种特殊的“时滞”。

三、结论与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几点有益的结论与启示:

1. 应更新对总量均衡状态的理解。传统分析中,均衡供求总量、从而一定时期的均衡社会总产出或均衡国民收入只是一个“点”概念,只有当总供给与总需求完全相等、社会总产出恰好达到这一点时,国民收入才算处于均衡状态。现在看来,这是一种过于简单的理解,也是对总量均衡过于苛刻的要求。事实上,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均衡总产出只能是一个“区间”概念,社会总产出一旦进入这一区间,市场机制就不会再对供求总量作出调整,因而总供求便应视为已经处于均衡状态。只不过,这种均衡只具有近似的意义,因为在总量均衡区间内部通常还会存在事实上的总供求不一致:当实际国民收入偏于“高位临界点”一侧时,存在一定程度的总需求不足;当实际国民收入偏于“低位临界点”一侧时,则存在一定程度的总供给不足。但由于这两种总供求不一致均处于总量均衡区间内部,市场机制对之已无法作出进一步调整,因而从市场运行角度看,才可视其为已经处于均衡状态。显然,这样理解总量均衡关系才是更为科学的,也是更为切合实际的。

2. 应重视总量均衡区间的存在所导致的特殊的宏观调控“时滞”,并采取适当的应对方略。总量均衡区间的存在必然会使宏观调控产生一种特殊的、本文所揭示的“时滞”。而宏观调控存在“时滞”将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因而,为尽量减少以至消除这种影响,在宏观调控实践中便应针对该“时滞”的存在明确提出并遵循“适度超前调控原则”,即在充分预见与估计存在调控效应“时滞”的基础上,将各项调控政策措施付诸实施的时点适度前移,以尽量缩短以至消除这种调控效应“时滞”。调控政策措施超前启动的时间幅度,理论上说应当等于当时宏观经济运行环境下推动总量均衡区间移动一个总量均衡区间宽度所需的时间,而在实践中,由于这一时间长度尚难以准确把握,因此,便应当在充分研究与借鉴以往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经济运行的具体状况,通过经验估计的方法慎重确定一前移调控措施启动时点的幅度,以期尽量缩短调控效应“时滞”,减少由此带来的各种损失,从

总体上提高宏观调控的效率。

3. 降低调节成本对提高宏观调控效率具有积极意义。由于总量均衡区间的大小与调节成本的高低存在同方向变化的关系,而宏观调控中的特殊“时滞”又取决于总量均衡区间的大小,因此,通过完善市场体系、优化市场环境、提高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水平等努力降低调节成本,不仅对微观层面上提高各经济主体的生产经营效益将产生重要作用,而且对宏观层面上缩短调控“时滞”、提高宏观调控效率,也将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管怀臻. 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微观调节成本问题[J]. 天津社会科学,1993,(4).
[2]管怀臻. 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总量均衡区间问题[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1,(5).
[3]管怀臻. 总量均衡区间及其对宏观经济运行与调控的影响[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4,(4).
[4]David Begg, Stanley Fischer, Rudiger Dornbusch. Economics (Fifth Edition) [M]. 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97.
[5]Walter Nicholson. 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s and Its application (Eighth Edition) [M]. The Dryden Press,2000.
[6]Stephen J. Turnovsky. Macroeconomic analysis and stabilization Policy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Aggregate Equilibrium Interval and Time Lag Effect in Macro-regulation

GUAN Huai-lin

(A Commercial College,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07, China)

Abstract: In modern market economy, a lower critical point and an upper critical point are located on the two sides of the centre point of aggregate equilibrium to measure the adjustment cost needed in aggregate supply control, according to traditional economic analysis. The two critical points demarcate a special aggregate equilibrium interval. Unfortunately the existence of so-called aggregate equilibrium interval results in a special kind of “time lag”, which has been neglected so far in the macro-regulation. To shorten and eliminate this kind of “time lag”, “the principle of moderate pre-emptive regulation”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integrated into macro-regulation.

Key words: adjustment cost; aggregate equilibrium interval; time lag

(责任编辑 许波)